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作品金库

(1901—2003)

*Rare Edition
of
All Previous Winners
of
Nobel Literature Prize*

人民日报出版社

Rare Edition of

Nobel Literature Prize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作品金库

· 小说卷 · (修订版)

(第九卷)

林 杉 宋桂芳 选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 契斯瓦夫·米沃什 (1980 年获奖 美国)**
猎人的一年 (节选) (3)
- 埃利亚斯·卡内蒂 (1981 年获奖 英国)**
醉 心 者 (39)
马拉喀什的声音 (节选) (52)
-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1982 年获奖 哥伦比亚)**
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 (78)
我受雇为人解梦 (85)
格兰德妈妈的葬礼 (94)
我只是来打电话的 (111)
- 威廉·戈尔丁 (1983 年获奖 英国)**
蝇 王 (节选) (134)
- 克洛德·西蒙 (1985 年获奖 法国)**
弗兰德公路 (节选自第一部) (183)

纳吉布·马哈福兹 (1988 年获奖 埃及)

- 候车亭下 (224)
- 黑猫酒馆 (232)
- 罪行 (243)
- 声名狼藉的家 (254)

卡米洛·何塞·塞拉 (1989 年获奖 西班牙)

- 痴情的少女 (266)
- 寡妇堂娜弗洛拉 (276)
- 流浪汉胡安尼托 (282)
- 矮个儿消夏者 (293)
- 心灵和眼睛里的拉·曼却 (304)



1980 年获奖作家

·美国·

契斯瓦夫·米沃什

Gzslaw Milosz

1911—

美
国

从波兰流亡美国的诗人、作家契斯瓦夫·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塞特伊涅的一个工程师家庭。

大学时，米沃什主攻法律，毕业后曾靠奖学金在法国巴黎留学两年，回国后在波兰广播电台文学部任职。

米沃什读大学时开始发表作品，曾发起组织了“扎加纳”诗社，193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僵冻的时代》，1936年出版第二部诗集《三个冬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被法西斯德国侵占，米沃什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沦陷的华沙与占领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战后，米沃什被新生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为驻华盛顿文化参赞，后又调任驻法国主管文化的一等秘书。1951年要求在法国政治避难。在法国流亡十年之后，1960年他移居美国，于1970年加入美国国籍。移居美国后，米沃什在加利

福尼亚州大学伯克里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讲授波兰文学。

米沃什早期诗歌流露出一种悲观绝望情绪，战争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对民族和全人类命运的忧虑，控诉了法西斯的野蛮，而在以后的创作中，则主要揭露现实生活中的虚伪、欺骗及浮夸等现象。主要作品有诗集《白昼之光》（1953）、《波别尔王和其他的诗》（1962）、《中了魔的古乔》（1964）、《战后波兰诗选》（1965）、《无名的城市》（1969）、《日出和日落之处》（1974）、《冬日钟声》（1978），小说《夺权》（1953）、《伊莎之谷》（1955）和散文评论集《被禁锢的思想》（1953）、《大陆》（1958）、《个人的义务》（1972）、《乌尔罗的土地》（1977），此外，米沃什精通波、俄、英、拉丁、希腊文和伯莱文，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曾把莎士比亚、弥尔顿、波德莱尔、艾略特等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波兰文，因此曾获1973年波兰笔会颁发的翻译文学奖。

1980年，由于他“以不妥协的洞察力描述了人类在激烈冲突世界中的赤裸状态”和他那许多种“引人入胜、富有戏剧性”的著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猎人的一年

(节选)

序 言

为什么我用这一书名呢？首先是为了纪念学童时期我爱读的一本书，这本书用的也是这一书名，它的作者是沃齐米日·科尔萨克。他从未被认为是作家，但他在大自然爱好者中却很有名气，他尤其喜欢自然界原始时代之美，喜欢前立陶宛大公园经过装点的土地。有无数像科尔萨克这样的绅士，特别是在白俄罗斯（每一个灌木丛都吸引住一位绅士）。科尔萨克来自维切布斯克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波兰站稳脚跟，并选择林业为其职业，但他也写作。他写的以《跟踪大自然》(On the Trail of Nature) 为题的小说是为居住在科尔萨克本乡本土的年轻读者写的，是两个男孩子暑假期间的故事。他的另一部小说《在荒野中》(In the wilderness)，显示出同样的回归大自然与同样的景色。这两本书谈的都是狩猎和对当地动物的观察。科尔萨克经常用令人很喜欢的插图来说明他描写的动物，但他对艺术的准确性和对细节的忠实性没有很大的兴趣。我对鸟类和四足兽的知识很多是从他那里得到的，因此，我认为，

借用他的书名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是适当的。

科尔萨克的《猎人的一年》是逐月对事情的记录，它是一本很简单的狩猎手册。可以确定：它主要记录的是北欧广袤的林区，而我的书却和这个主题毫无共同之处。我的书和科尔萨克书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在记录形式上却和他的书有大量共同的地方。在我迄今的一生中，它是一年的日记：从1987年8月到1988年8月。我是一天一记，或几天一记，但由于我不断地回溯到我曾知道的很早以前的事与人，因而在本书中，过去和现在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一年我是在伯克利度过的，但我不仅在伯克利，还时常到欧洲去旅游。虽然这十年来，我后期旅游的次数少于前期，但仍在进行，我是在坚持不懈地旅行。

对于选用这一书名还有另一解释：我年轻时“跟踪大自然”远游的梦想虽从未实现，但我变成了猎人，尽管是一个不同类型的猎人。

1987年8月1日于伯克利

每天都在惊奇的感觉中度过。我已开始我生命中的七十七岁。我一再对自己说：七十七岁了！但这并不能使自己相信真是这样了。我身体内部以及我周围正发生的事并没有在别处发生，而是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离威尔诺是如此遥远）。

一个美丽的夏季，只有极少有雾的日子，即使有雾，它也在中午前后消失掉。庭院中正百花争妍：向日葵、山梗、牵牛

花、新几内亚的凤仙花，等等。公主树已开花一个月，它能一直开花到夏末。我们去年种的鼠李依然是皮包骨，它的枝叶被鹿嚼碎了，鹿还把邻近灌木丛中的花都吃光了。

昨天晚上，我们沿着山路再次登上格里兹利峰。汽车停放在路边，人们俯视海湾，欣赏远处辽阔的景色：桥梁、旧金山、奥克兰，以及著名的当地日落景色，此时之美犹如一幅光辉灿烂的绘画，涂上一层粉末。我们接着洗蒸气浴；在黑暗的天空下，在池内游泳，仰身望着天上的星星，虽然永远弄不清究竟是星，是飞机，还是宇宙飞船。

1987年8月2日

我的诗说：“我不知道伯克利山将来是不是我的葬身之地”，也许不是，因为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一切事情都不是肯定的。我住的威尔诺是“阿特兰蒂斯”（大西洋中的一个神秘岛屿，最先由柏拉图提及，臆断在直布罗陀之西，据说最后沉入海底）。但我不能猜想将来我是否会回到波兰，虽然在团结工会当政较自由的时期，我曾访问过那里。当我的朋友（齐格蒙特·埃尔茨、约瑟夫·萨齐科和科特·耶伦斯基）一个接一个死掉时，巴黎变成人口日减的城市。无论如何，不管我住在什么地方，我总是处于游离状态，就像现在在伯克利一样。在这里，我难以有任何理由永远沉落到这座城市中。

美
国

书与词典对我写小说来说，是足够的材料了，但我还是不

乐于写小说的。也许这是诺贝尔奖的意念造成的，认为我的名声是窄狭的，仅限于诗的读者。但我尊重注定我命运的天意，也就是说，千万不要太有名，要恰如其分。

小说的优点在于我们可借它描写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而无需对他们指指点点，就是说，向他们提供适当的保护。但在写日记或报纸上的文章时，你没有这种特权，似乎你应把一切顾虑都抛掉，就像今天很多人做的那样。

没有我的允许以及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原因，华沙《政治报》发现和重印了我的《挽歌》，这是我四十年代末的作品。甚至《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迈克尔·考夫曼也写了介绍这一作品的文章，因为这篇作品在写其他事情的同时，也写了华沙犹太人街墙边的转轮飞椅（供儿童玩的一种游乐场装置），因此，它被当作扬·布隆斯基在《普世周刊》上的文章（谈论波兰人的漠不关心）所掀起的讨论的继续。考夫曼把波兰文的“Karuzela”译成“闹饮”，但这个字的意思是儿童骑在马上转圈圈，实际上是坐转轮飞椅，孩子们坐着它成双成对地飞向空中。可是知道转轮飞椅的人并不多。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这篇文章，读着它，仿佛是别人写的。我们对自己行为的好坏有时全无认识，这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知之甚少，而且，如果自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那就没有“最后审判日”，因为我们和任何别的人对这一节日从不知晓。在这篇我不特别喜欢的文章中，我的同情心是有根据的。

我必须根据我自己的行为进行判断，这是很自然的，我要经常考虑我自觉的程度。一个人怎样从真实的估价去区别精神、幻想、象征性的行为等等呢？我知之甚稔的是：有罪的感觉与经常自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基本原则应是用最好的知识来武装一个人，使他有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能力。

1987年8月3日

我要把两年前在我的笔记本上写的东西复印出来，因为它同昨天我看到的有关。

马雷克·扎莱斯基的书《第二个前卫的冒险》中所描绘的似乎正是我的化身。真奇怪！我是从文章，从信中进行摘录的，我已完全忘记我曾写过这样的文章和信。我也发现我的异化的推理。我的书是为我们的诗友写的，他们确在我身旁。有上千的人在等待着，他们全神贯注地竖起他们的耳朵，只要一首诗谈到政治，谈到我们为政治服务，就会出现这一情景。在广大基层，由于人们文化极少，什么书也读不到，由于这一原因，为群众发明了电视，以消磨他们的时间。暧昧不明的理智主义，徘徊于波兰语和依地语（一种为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之间（在威尔诺，是徘徊于依地语和俄语之间），因为整个环境百分之八十的人是犹太人。另一些人有右翼倾向，重仪式的天主教教义，对智力缺少兴趣。莫非是一个犹太人遇到了非犹太人？一个聪明人遇到了一群傻子？在世俗的宗教领域内，一个神秘主义者遇到了一位信徒？在这里，是圣母起了帮

助作用吗？无疑地，我的立陶宛世系使我以更多的方法摆脱了真实的或想象的狡猾的波兰迫害者。我可能是非正义的，但我对这个时代的社会学或政治分析没有兴趣，这是我回忆起来的当时感觉。

整个前卫派是可笑的，大学不能没有年轻人，整个国家的生活中更是这样。人们每天的生活是在工作、娱乐、恋爱、结婚、生育和各种各样的事情中消磨掉。然后是文学批评的来临。对现实的扭曲来自前卫派诗人的思想与写作。我回忆起和我同时代的一些人，他们经历的世界和我完全不同，他们有不同的观念与感觉。

美
国

伊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他的自传《爱情与流放》中描绘了三十年代的波兰。我从未加入华沙的犹太人俱乐部，即使这样，我也形成自己的意见。此时，年轻的犹太人正离开他们父辈的信仰与习俗。我的异化思想与辛格的思想有许多类似之处。作为犹太教牧师的儿子，辛格受到宗教教育，因而，他虽已世俗化，但他是很复杂的，在他的共产主义作家同僚中，他却崇拜火神；他没有紧跟犹太复国主义，而发展了一种虚无的远离艺术，成为依地语的一位作家，但这是为了谁呢？当希特勒的德国掌权时，辛格的判断是正确的，就是说，德国不久就要占领波兰。辛格于1934年到了美国，正如他自己说的，很多年他为不能写作而痛苦。但由此造成的损失却转变成幸运，因为在寻找立足之地时，他发现了他儿时传统的犹太人世界，还有从儿童时候起就盘踞他心灵深处的重要的形而上学方面的

问题。我也在我移居危机时期寻找我儿时永远失去的东西。在叙事天才上的确令我羡慕的辛格，他毕生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上帝为何容许这么多的罪恶？他对恶人感到厌恶，这在他以后的短篇小说《悔罪》中公开爆发出来了。当我读《悔罪》时，我对自己说，辛格对 Hassidic 的正教和我对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抱的是同一态度。这就是我同辛格真正血缘关系的泉源，这比任何其他在世的波兰或美国的散文作家都强烈。诺贝尔奖金给了这两个具有异化思想的作家。

1987年8月4日

5月间我在欧洲。5月3日下午我坐飞机到达巴黎，第二天早晨，摄制一个文化节目的电视组的工作人员出现了。正在进行录音时，电话响了，传来了科特·杰伦斯基逝世的消息，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几周的任何时候都有这种可能。他的死是令人痛苦的，他是多么被很多人，被我需要啊！在利奥诺的请求下，我为《世界报》写了一个讣告。去里尔参加一个讨论古代波兰问题的会，通过三天的积极参与，使我心灵深处充满了同1944—1945年有联系的事情，并惊奇这样一个会议竟能在这里举行，在四十多年之后，有如此多的好文章，其中包括波兰教授写的，这使我感到变化逐渐发生了。

天在下雨，很冷，就像5月间大多数的天气那样；卢加诺也如此，在那里，国际笔会的会议于5月10日开始举行，我们都要作公开演讲。我在整个会议期间采取的都是不冷不热的

态度，即使他们用汽车把我们送到米兰的斯卡拉音乐厅去听钢琴演奏，去参加由克里齐亚大时装厅作东的欢迎会，我也未变。

在日内瓦让娜的家作短暂的停留，天在下雨。和让娜同车去洛桑拜访“格兰德玛”（Grandma），也就是我常称呼的伊雷娜·芬岑茨夫人。多么高兴啊！喜欢她的人也应该在这块土地上散步。可是今年春天，这块土地上失去了我的朋友塔德乌什·贝尔斯基，正直的典范，我曾和他一块在威尔诺电台工作，他死于华沙。

1987年8月5日

从日内瓦到门通要两天，住的是我知道的艾格隆旅馆。这里也在下雨，我乐于和同伴尼拉和珍妮克谈话。回到巴黎，多云，有雨。

和其他人一样，我也着迷于同杰伦斯基谈话，我有点嫉妒他。我嫉妒什么呢？是他的充实的生活。和我比起来，他是由较贵重的金属制成的，尽管他有点阴沉。

在过去几年中，我喜欢上了法国，但我曾一度在这里受苦。如果五十年代时我不渴望成为一位被认可的诗人，也许那时我不会感到如此丢人。加利马尔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得奖的欧洲人》，但自从难以在书店找到我的书以来，似乎我的书在发行系统中被毁掉了。卡米活着时，我在加利马尔出版社有一个伙伴。当一位意大利出版商给加利马尔写信询问《被束缚的

思想》一书时（我想是在七十年代末，在我即将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前），加利马尔出版社回答说，作者是无名之辈。所以会这样，其一部分原因是我可能被夸大为神经过敏的人。在那里，我从未有在家的感觉，而对一位作者来说，很重要是能走进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被以“我们自己人”相待，就像我现在在圣徒佩雷斯街的法亚尔出版社这样。

1987年8月6日

雾在向下翻腾，笼罩了旧金山，海雾使我们感到寒冷；太阳在下午4时左右才露面，到了6时，它又被雾覆盖了。

我的生活是在冒险，正像我对自己形容的：“一位吟唱诗人在轴架上旋转。”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地在波兰生活了30年，然后于1981年，我得诺贝尔奖金后，为祝贺我，在拉津基的夏宫，我受到文化部长的接待，接着我再次被扔进垃圾堆。但是我同奥斯卡·米沃什的冒险更令人惊奇。1987年5月24日，是星期天，我从里昂车站乘车去枫丹白露。在列车的右方，有常见的堡垒和树木，接着，火车通过布鲁诺伊，我注视着地平线上出现的布里—孔德—罗伯特大教堂的高塔。

1931年夏天，我曾乘火车到枫丹白露，当时我才二十岁。我们是三人结伴去巴黎的，三个人是罗伯斯比（斯特凡·英德里霍夫斯基）、象（斯特凡·扎戈尔斯基）和我，我们穿着衬衫，是短打扮，因为我们的行囊沉入莱茵河上游的激流中。奥斯卡送钱给我，并劝我在萨马里泰恩买一套衣服，因此我穿的

虽不华贵，但还是合乎时尚的。一个年轻妇女坐在我对面。我是外地人，我迷上了她——这位巴黎女郎。说我现在在这趟车中不想她，是不真实的。当时她大概是三十岁左右，也就是说，加上五十六年，她现在应该是八十六岁了，最大的可能性是她已死很久了。

此时，在枫丹白露，奥斯卡在他住的艾格勒—努瓦尔旅馆的房间里接待了我。鸟笼内的鸟是非洲的麻雀，他未能把它们释放到公园去，他说他绝非有意把当地的鸟囚禁起来。我的带有忧虑情绪的关心，我对我的法国关系的委屈求全，我对布罗尼斯瓦娃·奥斯特罗斯卡翻译我的《米格尔·马纳拉》的真正的愉快心情，以及我对我们命运纠缠的完全忽视，这在许多个十年之后，才有了收获，我为此而努力是在到了美国之后。在美国，我发现了奥斯卡同克里斯蒂昂·高斯的通信。我认为我有义务出版他的作品，因而我将《阿尔斯·马尼亚》和《阿尔坎斯》译成英文。最终它们成了《高尚的旅行者》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他大部头的著作，我为该书写了前言，它于1985年出版。在伯克利书店，《高尚的旅行者》和我的诗集并列在书架上。

1987年8月9日

去沃尔纳特克里克参加埃娃的婚礼，然后在丹维尔的公园举行招待会。当我于1960年同扬卡和孩子们第一次来到伯克利时，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为我们开车绕城市一周，让我们

看一下整个城区，在伯克利山以东，是大片的乡村，山谷中是栗园。较高的稻草色的斜坡上，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点缀着黑色的橡树。而今，到处是城市：街道和房屋，其间遍布着草地、网球场、游泳池和公园。还有地下铁道，它在这里是铺设在地面上的，从旧金山，同所有的道路连接。我不能肯定我是反对发展，但这种发展却破坏了自然景色。这里的天气和贝克利不同，海雾扩展不那么远，天空经常是蓝的，每样东西都被太阳烘烤着，因而，人们与草木结了解不解之缘。

这使我在有生之年结束了乡村生活。就全球范围看，这里发生的是一种模式，并不是说，到处都要这种模式，但这一清晰的模式却正在发展着，它在人口密度上表现得最显著；因而住宅区扩散到很远的地方，乡村成了保留下来的遗迹，但依然维持着人为的灌溉与树木。给运动场留下了空间，种植保持分散状态，可是不再有小村庄了。

我的乡村儿童生活不同于今日儿童的生活，这主要表现在：那时成群的昆虫在嗡嗡叫，它们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叮、咬与爬行。人们的双足上布满了因经常抓搔而造成的伤疤与斑痕。蟋蟀在草地上跳跃，甲虫在四周竞走，各种体积不同的红蚂蚁（咬人最厉害的一种）和黑蚂蚁群集，多种颜色与形状的毛虫在叶间，在室内，在厨房和某些房屋的墙壁上被发现，在盛饮料的玻璃器皿内常有厚厚一层淹死的苍蝇。化学方法被用于抵御整个昆虫世界，这些现象标志着我的儿童时代，而与此同时，周围还有众多的鸟类。而在今天，吃虫的鸟类的生活却